

民國史料研究叢書之三

羅志希先生傳記暨著述資料

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出版

羅志希先生傳記暨著述資料

羅志希先生傳記暨著述資料

目次

羅志希先生遺像	
羅志希先生遺墨（手書自傳）	
憶志希——一個並不懦弱的人	黃季陸……………一
志希先生八十誕辰紀念題詞	秦孝儀……………
追念我的父親	羅久芳……………一九
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	蔣永敬……………三五
羅志希先生的大學時代	李雲漢……………八五
羅家倫先生大事年系	呂芳上……………一一三
羅家倫先生著述年表初稿	夏文俊……………
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計劃	劉世景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	編輯小組……………二四九

憶志希——一個並不懦弱的人

黃季陸

自羅家倫志希先生於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逝世，迄今已七年，一直想好好寫一篇文章來追念他，然每次都握筆而停止下來！現在又是他逝世七週年了，史料研究中心同仁要爲他出一紀念特刊，我又因事務太忙，而趕不及完稿。好在一個月前傳記文學社，舉行了一次人物座談會，是以羅先生爲主題的，我是出席發言人之一，該社劉紹唐先生把紀錄稿送我校正，我覺得紀錄得尚屬清楚，經我略加改正後，我認爲這可以同時充作我對特刊的紀念文章。雖然表面上看來，這是一種偷懶的辦法，但是總比不寫文章來紀念這位好朋友的好。我在此要特別感謝傳記文學社紀錄的先生，使我內心免於對於過去的好朋友存在一些遺憾。

我與羅志希先生有多層的關係，我先從這些關係說起：

第一層關係是：我同他是復旦公學中學部的同班同學。我們復旦同班同學今天較爲世人所知的有數人，一是吳南軒，曾任抗戰時期復旦大學的校長，在臺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；一個是我；一個是余英傑，香港中國銀行總經理，後來跳樓自殺；還有一個就是志希；此外我們復旦的同學，高我們一班的有程天放，低一班的有余井塘先生等人。

第二層關係呢，現在人講學派，我們復旦出身的人也幾乎成爲一個學派。志希先生到臺灣之後出任國史館長和黨史會主任委員，我是接他的後任。天放和我的關係也有許多巧合。民國十一、十二年我在加拿大辦「醒華日報」，我回國之後，即把醒華交給天放；後來天放做四川大學校長，我又繼他

出長川大。在民國三十八年大陸即將淪陷時，到了廣州，天放先生其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，他大概想要擺脫，他說，季陸你來了很好，宣傳部的事情要你去。我當時就對他說：照你這樣講起來，天下事就由我們兩個人包辦了。天放被我幽了一默，啼笑皆非，只好作罷。由於我跟志希、天放都是復旦的同學，後來在職務上的關係，好像是一個小團體似的。

我要先聲明一點，我們今天大家都在說志希的好話，不過，對於志希，我過去一些時候對他的印象並不太好，雖然我們感情不錯。這話從何說起呢？我們自民國六年在復旦畢業之後，志希就考上了北大，五四運動發生，志希更成爲一時的風雲人物。那時我在日本，志希同我通信，老是說我們北大如何如何，從來不提他是復旦出身的。可是北伐之後，因爲復旦是革命的學府，復旦師生許多出任黨國要職，像于右任、邵力子、葉楚傖、劉蘆隱、余井塘諸人以及我個人，都是置身在革命行列，而這時他則言必稱復旦，什麼我的同學于右任，我的朋友劉蘆隱，我的老師葉楚傖、邵力子等等。我就笑他說：「你從前在北大的時候就忘了復旦，現在你只曉得復旦而忘了北大。」

我跟志希在復旦中學同班，有幾件有趣的小事，現在無妨談談。志希的中國舊文學的底子很好，下筆千言，那時還是中學的時代，同學都稱他爲「老夫子」，那時大家年紀小，把老夫子叫他，多少涵有一點諷刺的意義，而他竟誇大的說他是「孔夫子」而不是老夫子，不料後來叫他爲「孔夫子」的人也竟增多起來了，他頗引以得意。我記得班上有一位老師林天木先生，見志希姓名叫羅家倫，就問他，「江西有位國會議員羅家衡，你們是不是一家？」他們本來不是一家的，志希却回答說：「我們是

同宗啊！」

志希中學時代，最崇拜君憲派的梁任公先生。我們革命黨人在思想上對梁頗有距離，甚至在情緒上積不相能。因為君憲派視我們革命黨人爲袍、土、革的暴徒，也即是認爲革命黨是和袍哥、土匪的三結合。的確有時候我們一言不合，便吵起架來，揮拳弄袖就要動起手打架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他總是讓步，於是我們就認爲羅志希不過是個文弱書生，是個膽小鬼（coward）。我這個印象一直綿延了數十年。其實這是錯誤的，志希實際上是一個最勇敢的人，他是勇於公義而怯私鬥。我爲說明這件事，這也是我今天要來參加這個座談會的原因。

志希最勇敢的事跡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。我現在舉個例子來說明。在民國十七年濟南五三慘案，日軍阻撓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，出兵濟南，並殺害中國交涉使蔡公時。是時志希和曾養甫奉派到濟南交涉署查看。這還不打緊，待其時，蔣總司令中正到了黨家莊，日本正向濟南進攻之際，這真是最危險的時刻，志希又和熊天翼（式輝）奉派與日軍福田師團長交涉，當時的情況非常險惡，志希此行，真是臨危受命。後來，他和我談起這事，我說：「你這個膽小鬼怎麼有膽子身入虎口呢？」他說：「赫！在那個軍事的時代，長官命令下來，那有不去的道理！」他勇於赴義，這是最大的勇敢。他那時是戰地政務委員會的教育處處長，蔡公時是外交處長。我們看他的報告，可以想像志希絕不是一個懦弱的人，而是個最勇敢的人。

志希的才華、文筆、著作等，是很出衆的，他的新人生觀一書，最是年輕人喜歡閱讀，而廣受稱道的書。在我看來志希所有的著作中，最足以表現他的風格的，還是他於民國十七年，上述隨北伐軍

，以戰地政務委會教育處長的身分，臨危受命，赴濟南向兇惡侵華日軍交涉，那段經過的報告。這篇報告不僅表現他個人的風格，而且是世稱所謂濟南「五三」慘案這段史實中最具權威的一項史料。我所以特別重視珍愛他這篇報告的原因，不僅在糾正世人對他遇事懦弱畏縮的觀念，更在糾正我自己以往對他的錯誤觀念。

他這篇報告的原文是：

「日本要滅亡中國，就絕對不能讓中國統一，它才可以分別的宰割。國民革命軍北伐出師以來，連戰皆捷，聲勢浩大。當民國十六年克復南京以後，日本就已經計劃在黃河流域打擊我軍，六月間我軍抵達山東臨城滕縣一帶，日本在七月間就從大連增兵三千多人赴青島。七月十八日日軍砲隊帶了十幾門大砲由膠濟路開到濟南，當時若是我軍繼續北伐，恐怕濟南事變早在那年已經發生了。不幸因為寧漢分裂的結果，總司令蔣先生在八月十二日翩然下野，北伐之師因而停頓，所以日軍因目標喪失，在九月三日日方駐上海總領事矢田致函我方交涉員通告撤兵。到十七年初，蔣總司令復職，仍然繼續北伐，經過大規模的部署以後，這一場志在統一全國的大戰，於四月四日在津浦線上開始。我軍於十日克復臺兒莊，十一日克鄆城，十二日下棗莊，十三日下臨城，十九日下鄒縣，二十日下曲阜兗州，張宗昌的部隊和支援他的奉軍望風西潰，於是日本海軍竟於二十日在青島登陸，而在青島的陸軍亦就開進濟南，這是日本第二次阻止北伐在山東境內的出兵。這種行動，真所謂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見，濟南的浩劫，是無法避免的了。二十一日我外交部雖提出抗議，但是有什麼效果呢？

四月二十二日，北伐軍克復泰安、肥城，二十九日第一集團軍的一部份已打到膠濟路的明水鎮，第二集團軍孫良誠部又抵濟南近郊。蔣總司令進入濟南城繼續指揮北伐是五月二日的事。我是在四月間和大軍一同由南京出發的，擔任戰地政務委員的職務，並兼管教育處。政委會的職權，是一個中央政府在前線配合軍事行動的縮影，每一個處代表中央一個部，在戰地行使職權，也就是說每逢克復一個地方，這地方上的政務就由該委員會的各處分別管理。我能代表大學院處理戰地教育事務，實感幸運。我於二十日到達兗州，對於該地教育工作，略事部署；然後沿北進途中，在泰安稍事逗留；直到五月二日晚間才進濟南城。三日一早，我到山東教育廳去視察，對於該省教育工作人員，尤其是教員特別加以安慰。不料我講話快完的時候，忽然聽見連珠的步槍和機關槍聲，據當地的報告，說日軍和國民革命軍已經在濟南城外新市區打起來了。於是我急忙地回到總司令部（該部臨時設在督軍公署裏面）見到蔣先生，簡單的商談應付方略，我們都認定，這件事是意料之中的，但是爲了完成北伐大計起見，還當盡力設法制止軍事衝突的擴大。在總司令部裏，各方的情報來得很多。我方搜到日軍指揮官發給軍隊的命令中有「命令一下，驟然而起」等字樣，可見此次的衝突，決非偶然而是奉命的。當時有一日本武官佐佐木逃避到總司令部，我們立刻予以保護。我方並以白布大書「禁止衝突，各軍立回原地」字樣，沿途巡行並禁止開槍，但是到下午槍聲還是激烈，大約是二點鐘時，英國曼傑斯特導報的名記者丁白萊（Timperley）亦避入總司令部，要求我爲他發一個電報出去。當時普通電臺因秩序紊亂，工作已受障礙。我想盡方法，由總部惟一的一座短波電臺將該電發出，這是濟南以外所收到關於濟南事變第一個電報，

而這個電報是一個中立觀察者打出來的，所報導的全是他目擊的事實，態度亦很公平。五三這天，外交部長黃郛恰巧在交涉員公署裏，被日軍劫持到日方軍部裏去。黃部長要想同日方負責人談話，曉以利害，不料不但這個目的不能達到，而且日方反脅迫他在一個報告上簽字，這報告是說中國軍隊在某處打死一個日本軍曹，其用意是要把戎首的責任加諸中國。黃堅決不肯簽字，但因被糾纏不止，祇在上面批了一個「閱」字，日軍才把他送回到我軍區域以內。最不幸的是戰地政務委員兼外交處主任蔡公時先生壯烈的犧牲了。蔡先生同黃郛一樣，曾在日本留學，兩個人都能說流利的日語，和日本人常有往來，所以我軍第二次北伐出師以前任黃爲外交部長，蔡爲外交處主任，原意就是爲便於處理對日交涉。不料蔡烈士竟因此而犧牲，這是三日夜間和四日清晨的事，日軍深夜將交涉員公署包圍，蔡烈士用日語抗議；日本兵將他捉住，加以侮辱，要他跪下，他拒絕下跪，遂遭慘殺。日本知道理虧，怕文明世界加以譴責，於是便進一步演出毀屍滅跡的無恥慘劇。蔡烈士死的消息和真相，我們到四日上午由他一個勤務兵逃到總司令部來報告後大家才知道。當時槍砲聲還非常密集，我們大家商量應當趕快提出抗議，宣佈日軍此種野蠻的罪狀。蔣先生乃囑我起草一個抗議，我寫就草稿，送請大家一再修正後，當天發出，也就在四日上午忽然來了一架飛機，在總司令部上空投彈；一個就投在總司令辦公室後面的池裏，幸而沒有爆炸；另一個炸彈落在我們睡房後面的一個四合院子的中間，一共死傷十九人，其中有官長二人。這架飛機標誌不明，很可能是日方的飛機，或是由日人駕駛爲張宗昌作戰的飛機，因爲張宗昌的殘破部隊裏，決沒有在當時這種新設備和駕駛員。四日下午槍砲之聲稀疏，日方的態度忽然和緩，日軍司

令官福田彥助遽然派一個參謀到總司令部來說這次衝突出於誤會，要商量解決辦法，經蔣總司令明銳的判斷，認為這是日方緩兵之計，不可上當。他表面仍和日方敷衍，可是到晚上他在正說右邊一個大廳裏和前敵總司令朱培德、總參謀長楊杰、高級參謀熊式輝，重新部署軍事，定下退出濟南將北伐大軍分五路渡過黃河的計劃。在這個大房間裏，把軍用地圖釘滿在壁上，鋪滿在地上，由熊高參拿了各種顏色的粉筆和一大塊橡皮，脫了皮鞋在地板上的地圖中間行走，擬定各路渡河後進兵的路線。每次劃到一條線之後，在場的人從各個角度加以考慮，再行更改或修正，如此在弄到深夜。那天晚上我因為有事進入這間房間，亦就默默無言的停留下來，看到終止。五日上午蔣先生要找擬一個給英美兩國在濟南總領事的函件，通告他們我軍退出濟南，僅留極少數維持治安部隊，使濟南成為不設防城市，此後一切外僑生命財產之安全如因戰事而受損害，應由日本負完全責任，同時提到我方為領館人員安全着想願意給他們一切應有的保護。當時在濟南祇有二個總領事館，我於五日下午五時將這兩件的中英文本預備完畢，下午六時奉命同曾養甫先生一同前往訪問該兩國總領事；我們坐的是總司令部的小汽車，並帶了三個衛兵一同出發；幸而得到沿途老百姓的通報，指示某街某巷有日軍哨兵及障礙物，要我們設法繞道避開；我們按照老百姓的指示，居然二館都能先後到達，雖然經過許多街口時流彈還在亂飛。我們兩人把這函件分別面致該兩總領事；他們都深感我方的好意，却都認為領事館是他們職責所在地，沒有奉到本國政府命令不能離開，他們對於日方起釁的經過是很明瞭的。我們辭別以後，到晚間十一點多鐘才迂迴的回到總司令部。我回想當蔣先生要我起草這個文件的時候，我曾經問他道：「我們就這樣退出

濟南城嗎？」我問這句話時，當然是我胸中有種不甘的心理。蔣先生回答我說：「等我把軍事擺開以後，才同他們說話！」事後我覺得這句話非常的有意義。其實就在那天下午，我軍已按照新定的計劃開始渡河了。

六日一早，蔣總司令和朱培德、楊杰、態式輝等一行便裝騎馬出了濟南城，我和陳立夫、邵力子、曾養甫、高凌百、和一部份總部人員還留在濟南城裏一天，料理未竟事宜。到下午五時，應辦的事大致已辦好了，於是我、邵、陳、曾諸人弄了一部舊汽車到一個澡堂子去洗澡；可是澡堂子裏已關門了。我們好不容易得到堂主的同情，知道我們在酷熱的天氣下日夜奔波，汗酸同灰塵凝成一片的痛苦；他居然叫人燒起水來，讓我們輕鬆一下。當時感激的情緒，真是不可言宣。

七日一早，我們一道由總部出發，因為譯電員黎琬同志工作勤忙，害了嚴重的燒熱症；我們不能在患難之中丟掉朋友，於是我們繞道把他送到齊魯大學的醫院，拜託該校教務長程其保先生設法特為醫療，然後向黨家莊出發。沿途經過白馬山地帶，祇見老百姓扶老携幼的逃奔鄉間，我們雖無老幼可携，而且病人已安置好了，但是這羣挑夫所挑當時唯一的那套短波無線電臺設備，是一件無價之寶，亦可以說是我們對外通訊的命脈。不料走到白馬山附近，天空又來了一架飛機，向我們的人羣行列飛來。那時候無處可避，祇能在一堆土堆邊把這幾挑無線電設備放下來，正當大家緊張的時候，忽爾這架敵機，在天空爆炸，引得大家拍掌歡呼。事後却有某部隊說是被他們打下来的，其實毫無其事，乃是該機因駕駛不慎，自取滅亡罷了。黨家莊離濟南城三十華里，我們直到中午方才同總部的朋友們會齊。當晚大家都住在總司令辦公的列車上。

八日上午又有敵機一架在列車的高空盤旋，這顯然是日軍的偵察機，在六日早晨福田還想不到蔣總司令會離開濟南的。等到上午十時，他接到報告蔣先生和他的總部果然出城了，於是敵人的總部起了一個大恐慌，福田急得頓腳，說是以後的事更難辦了。因為福田原來的計劃想把我們的總司令圍困在濟南城裏，無法指揮所屬部隊，於是他可以盡情勒索。想不到神龍得水，從此行動自如。他以前計劃好的陰謀，突成泡影，焉得而不氣到咆哮蹬腳呢？在七日和八日的敵機，都是爲偵查蔣總司令行動而來的。午飯以後，總部辦公的列車開向泰安，到達車站時將近黃昏。蔣先生是喜歡山居的人，於是雇了十幾乘兜子，大家齊上泰山。走到第一階段斗姆宮，稍事休息；當時第六十師師長蔣光鼐和第六十一師師長蔡廷鍇，也跟着上來報告軍事進展的情形。大家乃一同進餐。不料飯未吃完，山下緊急的遞步哨飛奔上來，送達一件福田的要求，就是下列五項，原文如下：

「貴總司令屢違對於中外之聲明。此次由貴部下之正規軍實現此不忍卒覩之不祥事件，本司令官不勝遺憾。其加諸帝國軍部及居留民之一切損害，以及有關毀損國家名譽之賠償等，雖有待於帝國政府他日之交涉，本司令官不欲置喙，然敢對貴總司令要求左列事項：

- 一、有關騷擾及暴行之高級武官，須嚴厲處刑。
- 一、對抗我軍之軍隊，須在日軍陣前解除武裝。
- 一、在南軍統轄區域之下，嚴禁一切反日宣傳。
- 一、南軍須撤退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兩側二十華里之地帶，以資隔離。

一、爲監視右列事項之實施，須於十二小時以內開放辛莊及張莊之營房。

盼右列事項，於十二小時以內答復。

昭和三年五月七日

午

臨時山東派遣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

蔣總司令閣下」

這五項條件，簡直把我們當一個戰敗國看待。其中那條要把我方抵抗侵略的部隊，在敵人軍前解除武裝，正是把我們國民革命軍當作投降的戰俘。這是我們無論如何受不了的！於是我們立刻下山，仍然回到列車裏面。總司令所住的那一節辦公車，原來是一輛爲鐵路工程師辦公用的，前半段是一間客廳，後面有兩間房間，一間是單人房，爲總司令的臥室，後面一間有四個鋪位；臨時由朱培德、楊杰、邵力子、陳立夫和我五人輪流睡眠。當晚先在客廳裏商定了答敵方的文件，一共是下列六條：

蔣總司令之答覆

一、對於不服從本總司令之命令，不能避免中日雙方誤會之本軍，俟調查明確後，當按律處分；但當時日本軍隊有同樣行動者，亦應按律處分。

二、本革命軍治下地方，爲保持中日兩國之睦誼，早有明令禁止反日的宣傳，且已切實取締。

三、膠濟鐵路兩側二十華里以內各軍，已令其一律出發北伐，暫不駐兵；但軍隊運動通過膠

濟鐵道並有北方逆軍之地方，或敵軍來犯時本軍亦復派兵往剿，至于濟南爲山東都會，及其附近公物場所，本軍有維持治安之責，應駐紮相當軍隊，保持安寧秩序。

四、津浦車站爲交通要地，本軍應派相當武裝士兵駐防，以保衛車站，維持安寧。

五、辛莊張莊之部隊已令其開赴前方作戰，兩莊之兵營，可暫不駐兵。

六、本軍前爲日軍所阻留之官兵及所繳之槍械，應即速交還。」

這是我們大家商量的結果，爲了貫徹我們預定的計劃，不願以「小不忍而亂大謀」，大家悲痛的情緒自可想見，但其中四、六兩條，也還是反要求的性質。商量定後，由陳立夫先生用毛筆寫下，時間已經到深夜了，我們回到這輪睡的房間，也不過分別的稍爲閉了一下眼睛，天就微明了。我第一個走到客廳中，看見蔣總司令已經穿着整齊的軍服，坐在那裡辦公，熊式輝（天翼）高參一會兒也就進來，蔣先生對天翼和我兩人說道：「昨晚所擬的六條答覆，請你們兩位做我的代表進濟南城去和福田交涉。」天翼兄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生，日話很好，我是不能說日本話的，蔣先生要我們二人一道去，大概是因爲如遇有關外交或國際法的問題，我可以和天翼彼此商量，而且我是戰地政務委員會的一份子，如有若干與該會有關的事件，還可以相機接洽處理。現在是戰時，統帥的話一出來，我們欣然立刻接受。照戰場的慣例，敵對方面有必要的接洽時，可以派遣「軍使」往來，於是我們立刻做了二面白布小旗，上書「軍使」二字。早飯亦來不及吃，我祇在總司令桌上取了兩小顆巧克力糖，放在口袋裏，就同天翼一道起程。此地我要補一句話：爲了處理這件有時間性的答覆，昨夜總司令的列車已恩恩開回到黨家莊。所以我們順着黨家莊的大路奔向

濟南。當我們重到白馬山，遇到許多難民善意的制止我們前進，說是前面有許多日軍見到中國穿軍服的人就要開槍掃射，而我們都是穿軍服的人。果然，我們前進不過幾十米，日軍的槍彈就由小山坡上飛來，我們用旗號阻止了他們的射擊，轉瞬就有四個日本兵走到我們前面。我們將我們的使命告訴彼等，並且要求彼等以軍用電話通知日軍總司令部派一輛汽車來接我們。於是其中的兩個步兵緊靠我們兩旁，走過許多水溝和泥田，到達一個連部，接通電話。日軍總司令部居然派了一輛汽車前來。我和天翼坐在後面，他們兩個官兵坐兩旁，前面一個日本司機和一個把槍口安上刺刀的步兵。經過相當的路程到了濟南城外的日本商埠，才知道他們的司令部原來設在橫濱正金銀行裏面。我們先把來意通知一個參謀，然後才同福田見面。福田態度顯出驕傲蠻橫，在談判的過程中，他尤其堅持要將陳調元、方振武、王均的部隊在日本軍前繳械。我們是決不肯，也斷不能屈伏的。他們滿臉凶煞之氣，以怒目惡聲相向。我們始終沉住氣來，以堅定的態度，據理力爭。當然在這個場合之下要求得到任何理性的結果是不可能的，於是我們要求他以書面答覆，讓我們可以復命。同時我們也希望他再寫一個蠻橫的文件，將來可以公諸世界。果然這一通牒和前者一樣，都是一件世無前例的哀的美敦書。其譯文如下：

「昨五月七日午後四時，本司令官將對貴總司令所提之五項要求條件，親交貴軍代表，雖通告內聲明限十二小時內回答，然至本日（八日）午前四時，仍未接獲貴總司令之正式回答；因此本司令官認定貴總司令並無解決事件之誠意，爲軍事之威信計，不得不採取斷然之處置，以貫徹要求。」

通告如右

昭和三年五月八日

臨時山東派遣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

蔣總司令閣下」

（附注：按本文所引福田彥助第一次及第二次均限十二小時答覆之通牒，均照原件重譯。）何以說是世無前例呢？按照國際慣例，對於哀的美敦書答復的期限，至少也是四十八小時，而此書則祇定十二小時，何況這十二小時的大部份都是深夜；加之距離既遠，交通不便，豈不是故意作難，以造成「不得不採取斷然之處置」這句話的藉口！無怪八日下午，我們再出城經過辛莊、張莊時，已注意到許多日軍紛紛進入這兩處。其實日軍於七日晚即已佔領辛莊、張莊，因為該兩處都是我們重要營房和糧台的所在地。

爲了等候這個文件，我們在福田辦公室的外間候了二小時，可見他們亦感覺措辭不容易。在等候的時間，他們的衛士居然爲我們開了二瓶太陽啤酒，這就是我們從天亮到下午二時所享受唯一的飲料和食料。我們臨走的時候要求他們把汽車送我們進濟南城，他們亦答應了。那時候汽車上祇有一個日本軍官一個兵，陪着我們。朝普瀝門的方面駛去，日本司機不很認識路，於是我告奮勇下車擔任問路之勞。那知沿途商店一律關着門，許多房屋亦是彈痕纍纍。要找一個老百姓問路，很難見到。忽而我看見一家門縫裡有一個老人在張望，於是我立刻跑去，從他得到正確轉彎的方向；不料當我下車問路之時，在前面同日本司機並坐的那個日本兵，趕快轉到後面我的空位

上坐下，因為他怕兩個穿日本制服的坐在前面，會受到攻擊，所以讓一個穿中國軍服的我坐在前面做他們的擋箭牌，這雖是一件小事，亦可以見得日本兵的小膽和機心。我們進城的時候要求他的車子停在城門口等待，轉身還送我們回黨家莊，這個日軍官答應了，然後我和天翼一同進城。在城門口碰到崔士傑，我就從口袋裡將任命他爲山東特派交涉員的任命狀交給他，以便在圍城裏遇有外交事件時，他可以負接洽和聯繫的責任。我們又見到留守衛戍濟南的蘇宗輦旅長和第一軍第一團李延年團長。我們轉述蔣總司令的命令，要他們盡衛戍的責任，不得向日軍進攻；同時日軍來攻的時候，必須死守，並予以重大的打擊；如不奉到退却的命令，不能撤出濟南。關於這個要點，以後的事實都證明了他們都會很忠勇確實的做到。我們在城裏訪問戰地政務委員會蔣委員長作賓的行蹤，知道他早已帶了一部份人員退出，所以我們在城裏約略巡視而後即行出城。走到普瀝門外，那輛汽車還在。我們要他送我們到黨家莊，他們最初答應了，但是汽車開出不到五華里的地方就拒絕再送。我們祇得下車步行，經過辛莊、張莊等地；沿途都是日本軍隊，以急行軍的姿態向前開動，等我們到離黨家莊不過三四里的地方，兩面的軍隊已開始以密集的砲火互相轟擊，子彈橫飛。我們知道這道火線是無法安全越過的，於是又後退二里，恰巧在路上遇到一輛日本的裝甲砲車，將我們攔住了。車上跳下一個士兵拿着手槍對着我們的胸口；我們昂然站住了，於是他們又把車上的一個小砲口對着天翼的頭；然後由車上再下來一個軍官，他對着我們說，他姓黑田，是福田的參謀，他說我們在福田司令部交涉的經過，他都知道。他隨即指着一個在附近開花的砲彈，由我方射來的，正色厲聲的對我們說：「你們看！這是不是你們打過來的砲彈？」我看